中國社會科學報
本版编辑：王俊美 美术编辑：王珠兰 责任校对：刘利召 电话：010-85885875 E-mail:gjyk_sscp@163.com

争 鸣

金砖国家研究需要注意的六个问题

◇江时学

2006年的金砖国家外长会晤开启了金砖国家合作的序幕，迄今为止，金砖合作机制已经走过16年的发展历程。在金砖五国的共同努力下，该机制已取得了一些开创性、标志性成果，成为国际事务中一支积极、稳定的建设性力量，同时也为中国的多边外交提供了新的平台。中国是2022年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在此背景下，中国学者在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提供学术支持的过程中，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关注。

明确金砖国家研究的两个不同范畴。在严格意义上，金砖国家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指五个新兴经济体；二是指国际组织（亦即金砖国家组织），尽管它无章程、无宗旨、无常设秘书处。就此而言，金砖国家研究涵盖了两个不同的范畴。如果仅将金砖国家视为五个新兴经济体，那么，金砖国家研究应该是近年来较受重视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组成部分；如果将金砖国家视为国际组织，则相关研究应该属于国际组织研究的一个部分。

众所周知，区域与国别研究和国际组织研究是两种不同的研究。两者依据不同的理论、回答不同的问题甚至使用不同的研究资料。因此，在研究金砖国家时，应该首先明确研究范畴，否则将混淆两种不同的研究，影响成果的质量。

明确双边关系研究与金砖国家研究之间的差异。既然金砖国家研究有两种不同的含义，那么，对五个金砖国家相互之间的双边关系研究，就不能等同于金砖国家研究。例如，南非与巴西的人文交流不是整个金砖国家组织的人文交流，而是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的组成部分；中国与其他四个国家的经贸关系合作也不是整个金砖国家组织的经贸关系，而仅仅是中国与其他四国开展的双边经贸关系。

这一区分非常必要。例如，中国与巴西的双边贸易一直在快速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金砖国家组织的贸易合作都是成绩斐然的。再如，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边界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金砖国家之间都有边界问题。

■4月26—27日，由中国科学院发起，南非科学院、巴西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印度国家科学院共同参与主办的金砖国家可持续发展大数据论坛，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行。图为4月26日晚论坛开幕式北京会场。 图片来源：中国新闻图片网

明确金砖国家各自的合作观。为了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我们应该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每一个金砖国家的合作观，亦即各国对合作所持的立场、态度、期待以及与之有关的外交战略。只有做到知己知彼，才能更好合作。但是，了解各国的合作观绝非易事，这一困难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并非每个金砖国家都有自己明确的合作观；其次，金砖国家的外交政策常因政府更迭而发生较大幅度调整，其合作观也因此处于变动之中；再次，有关立场具有一定保密性，其他国家很难得知。

尽管存在上述困难，学者们还是可以通过加强对金砖国家外交政策的跟踪研究，多做实地考察，多与相关国家学者及外交决策部门交流来获得更多、更准确的信息。

明确金砖国家研究的主攻方向。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五个国情大不相同的新兴经济体创建了金砖国家组织，定期举行首脑会晤。由此可见，五个国家希望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甚至奋发有为的决心是强大的。从每一次领导人会晤后发表的宣言中可以看出，金砖国家组织似乎有意在所有领域加强合作。这些领域可被概括为“三轮驱动”，即政治合作、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

十多年的合作表明，“三轮驱动”中政治合作、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的难易程度不尽相同。举办一场运动会或合拍一部电视剧，即可被视为促进了金砖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但如何促进五国在金砖国家组织框架内开展政治合作和经济合作，却依然是困难所在。因此，在研究金砖国家合作时，应将政治合作和经济合作确定为主攻方向。应该指出的是，五个国家的学术界应当为推动金砖国家的政治合作和经济合作提出更多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进一步强化应用对策研究。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金砖国家研究当然需要理论的指导。但是，西方学者创造的多种多样的国际关系理论或中国学者创造的为数不多的几种理论，未必能为金砖国家合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事实表明，迄今为止，金砖国家合作取得的成就难以归功于国际关系理论。换言之，如果国际关系理论能为金砖国家合作指点迷津，那么五国合作的成就可能会更大。

基于此，就当下的金砖国家研究而言，应该少关注些主义，多关注些现实问题，注重在实践基础上提出可操作性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尤其在中国担任轮值主席国的2022年，中国学者应该就乌克兰危机对金砖国家合作的影响、如何落实《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2025》、如何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反对美国的“伪多边主义”等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努力克服金砖国家研究面临的各种制度性障碍。自金砖国家组织成立之日起，金砖国家研究就应运而生。毫无疑问，十多年来，金砖国家的学者献计献策，为金砖国家合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随着金砖国家合作的不断深化，五国学者应该为其提供更有力的学术支撑。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以下几个障碍。一是扩大信息来源、掌握更多具体信息。如果学者只是依靠新闻报道中的只言片语做研究，那么，其研究成果只能是“马后炮”，或是“隔靴搔痒”的所谓“政策建议”。二是要在掌握五国整体情况的基础上开展具体国别研究。目前，从事金砖国家研究的学者多是侧重其中一国，懂得所有五国内政外交并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寥寥无几。例如，研究俄罗斯的未必了解巴西，研究印度的未必了解南非。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从事金砖国家研究的学者必须加强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才能做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综上所述，金砖国家研究仍是一个亟待提升的研究领域。令人欣慰的是，区域国别学有望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作为区域国别学的组成部分，金砖国家研究有望再上一个台阶。但在可预见的将来，金砖国家研究尚难升格为“金砖国家学”。毕竟，能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不能只看组织本身，更多的还要看未来的金砖国家研究能否拿出具有超越性的研究成果。

（作者系上海大学特聘教授、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专家委员会副主席）

读书会

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文化寻根』

——评《传统文化与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

◇欧亚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如何塑造和提升与自身实力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在“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下成为一个带有现实焦灼感的命题。

外交学院副院长、北京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孙吉胜教授等学者的新著《传统文化与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系统、全面研究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该书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话语的演变历程，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外交实践和理念之间的逻辑关联，揭示了将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外交话语资源，进而转化为中国话语影响力的历史经验与现实路径。这本著作的研究取向与内容体现了国际关系与外交学学科研究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既是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组成部分，又是对这一话语体系建设的有力支撑，对于理解中国外交也非常有益。

这本著作既有凝练的概念总结，也有具体的案例分析。作者基于国内外研究成果概括了“文化”这一复杂概念的意涵，从文化影响国家行为体的世界观、行为方式和思维习惯、外交理论构建、外交政策制定等方面，阐释了文化作为一种恒定因素对中国外交的框定式影响，又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择其精要，结合外交案例阐发了受中国文化浸染与涵养的中国外交哲学，即重视整体思维，坚持中庸之道、强调事物的关联性，崇尚和合、重视和平，正确对待事物差异，强调转化性思维。

作者根据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历程，将中国外交话语实践划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初期、世纪之交、21世纪初、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这五大历史时期，深入分析了在不同时期特定国际环境、国内条件、利益需求、外交决策者认知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外交话语的影响。作者认为，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谋求建立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到改革开放初期“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世界各国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到冷战结束后初期提出“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外交战略与理念，到21世纪初倡导的“和谐世界”与“外交为民”理念，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中国顺应世界形势的变化以及自身发展要求，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外交实践中汲取养分，在继承中不断创新的发展历程。

中国外交话语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为底蕴、以中国的现实国情为基础，寻求中国价值观与人类普遍愿望的共鸣，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也使中国外交话语的内涵不断丰富。在具体分析中，作者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在特定历史时期对中国外交话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影响，既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又反映出不同时期的外交话语实践差异。研究着重阐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文化自信与自觉，指出这种自信和自觉源于中国自身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提升的客观事实，也体现为中国对自身实力和地位以及同世界关系的认知变化。中国外交更加强调文化的指导作用，注重宣传和展示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通过人文交流夯实国家间关系的社会基础。

作者认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更加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与哲学根基，第六章对此进行了系统阐释。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中的大同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文化与新型国际关系、丝路文化与“一带一路”倡议、礼文化与全球伙伴关系、知行合一与全球治理观，均为深入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文化维度的解读。在从传统文化角度回答了中国外交话语“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之后，第七章从中国外交的道路观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国家观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秩序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交往观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价值观与坚持正确义利观等方面，进一步对中国外交话语“如何构建”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

这本著作是中国外交学研究尤其是中国外交话语研究的一次“文化寻根”。作者通过扎实的史料梳理及深入分析，全面系统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外交目标、原则、政策、手段和途径的影响，并从“文化—话语—实践”三因素互动的角度呈现了中国外交构建独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有机话语体系的过程。如作者所言，这是中国随自身与世界关系的改变，更加重视传统文化、并将其用以指导与推进外交工作的过程，反映了中国作为文化大国在对外交往过程中日益增强的文化自觉性、自主性与自信心。这一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之于外交关系的阐释，理解支持中国外交的文化动力，更在于通过重新发现与认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来阐明中国外交所秉持的价值观念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以此重申中国外交话语研究的逻辑起点，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研究增加基石。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习惯用西方理论和思维来解读中国外交行为、政策与目标，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存在很多有意无意的误读甚至曲解，演化出所谓“国强必霸”等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这本著作通过对中国外交理念和主张的“正本清源”，阐明了中国外交从优秀传统文化中继承和发扬的“和合”等价值观念是中国打破“国强必霸”逻辑的根本原因之一，有益于国际社会更好地认知和理解中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选择的道路。

这本著作虽然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及中国外交话语建设的主体性，但是以开放、包容、务实的态度开展研究。作者认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进行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并非强调文化是唯一解释要素，也不是要全盘接受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尤其是要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中国与世界连通融汇的元素。这本著作的一大亮点也在于分析了不同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话语的认知与理解，以更全面地看待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成效。一方面，中国的外交话语不是封闭的体系，只有取得国际社会的认同，话语作为权力才能发挥作用，才能与西方国家在话语层面更好地交流；另一方面，作者超越“实然”，以理想主义的情怀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应然”，即中国不仅要从政治和经济上，也应从话语和思想上推动世界进入多极时代。

当然，这本著作也有其不足之处。其研究旨在从中国外交话语发展历程的纵向时间段上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横截面，每一个章节的结构设置较为规整，但这造成全书多处都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从内容上看还可以更有区分度与论述层次。这本著作可以作为国际关系、外交学、语言学等专业的授课参考书，但需要引入文化、话语与外交学交叉研究的更多相关基础文献辅助阅读。

跳出以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强权政治等为基础的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窠臼，推动中国特色国际关系与外交学研究，本身就是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总体来看，这本著作对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外交学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作者系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外交学院北京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执行主任）

■《传统文化与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资料图片

一带一路

正确认识“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理念

◇丛晓男 王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顺应各国人民过上更好日子的强烈愿望。三个“顺应”抓住了价值理念的本质，关乎“一带一路”能否广泛凝聚全球共识。“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认识渐呈纷繁多元景象，一些错误论调不绝于耳，加大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风险。要消弭这些杂音，必须建立起属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鲜明的价值理念，超越传统地缘政治观、倡导新型全球治理观、秉持正确义利观是三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石。

“一带一路”倡议成果丰硕

“一带一路”建设已取得丰硕成果，主要表现为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核心内容的“五通”建设有效推进。

一是政策沟通不断加强。与我国就“一带一路”倡议达成共识的国家和地区持续增加，众多重要国际机制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示认同和支持，并将其核心理念纳入各自成果文件。截至2022年1月，我国已与147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涉及基础设施建设、经贸、产能合作、生态环保、人文交流、抗击疫情等多个领域。二是设施联通建设进展显著。随着交通、能源管网等大批项目落地实施，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区域交通可达性、资源流动性、信息共享能力显著增强。三是贸易畅通取得明显成效。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往来频繁，贸易潜力陆续释放，贸易规模持续扩大。2013—2021年，我国与沿线国家年度贸易额从1.04万亿美元扩大到1.8万亿美元，增长了73%。四是资金融通能力逐步推进。“一带一路”融资环境有效改善，投融资体系不断完善，多双边投融资机制逐渐建立，多方投融资平台发展迅速，资金融通能力逐步增强。五是民心相通筑牢合作根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人文合作领域愈加宽广，人文活动影响力逐步扩大。中国与沿线国家互办艺术节、电影节、音乐节、文物展、图书展等大量活动，其中很多活动已形成了常态化机制，为沿线各国提供了良好的人文交流平台。

确立“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准绳

在“一带一路”建设取得显著进展的同时，出现了“地缘扩张论”“规则破坏论”“经济掠夺论”等错误论调。这些错误理解的根源在于一些国家仍然无法跳出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窠臼，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对现有区域合作机制的威胁，曲解和抹黑“一带一路”的义利观。“一带一路”倡议需建立系统的价值理念，并围绕这一理念加大推进舆论宣传，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紧扣地缘政治观、全球治理观、义利观三个基石，全面确立“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准绳。其中，超越传统地缘政治观是重塑格局视野，倡导新型全球治理观是甄别治理模式，建立正确的义利观是明确利益导向，三者缺一不可。

正确认识“一带一路”需超越传统地缘政治观。深入理解“一带一路”价值理念，必须跳出传统的地缘政治观，站在全球发展的新形势上加以审视。“一带一路”倡议是处于探索中的国际合作倡议，无所谓“战略目标”或“路线图”。各参与国在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将逐步形成利益和命运紧密关联的共同体，这种尊重、平等、合作的逻辑与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基于控制、扩张、对抗和谋霸的逻辑具有根本不同。

实际上，不能将“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源泉狭隘地限定在地缘学说中。一些国家和学者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作中国的地缘政治工具，并基于历史上某些著名的地缘政治理论加以解读，有意或无意渲染中国威胁。弥散着国家中心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论调的地缘政治学说对于当代全球许多重大现实问题缺乏理论解释和行动指导能力，试图在地缘学说中寻找“一带一路”的理论依据，很可能徒劳无功。“一带一路”不仅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更借用古代中国对外交流合作的理念与经验，符合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天下大同的理念，符合中国人怀柔远人、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因此，中国历史与中华传统文化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营养源泉。将“一带一路”倡议代入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场景中加以论证、批判甚至渲染威胁，刻意迎合充满敌意的预设想象，显然找错了理论渊源。“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并取得巨大成就这一现实，恰恰反映出传统地缘政治经济理论面临的困境。

正确认识“一带一路”需倡导新型全球治理观。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正处在变革的关键时期，既有的治理体系已无法有效应对新的挑战。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提出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的新型全球治理观，为推动全球治理走出困境提供了建设性方案，是对全球治理倒退的有力回应。新型全球治理观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和协同性、治理空间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治理原则的公平性和公正性。

“一带一路”倡议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终极目标，不以政治制度、文化、意识形态划界。其一，不参与国家内部划分圈层等级。所有参与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一带一路”大家庭中的平等成员。其二，“一带一路”倡议不会选择性吸收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践行扩大开放的重要平台，其开放包容的性质不会变化。“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中国的“小圈子”，而是一个具有广泛共识、成员彼此平等、向世界敞开怀抱的朋友圈。

“一带一路”建设不搞“规则破坏”，无意于破坏原有的区域协作机制。“一带一路”沿线存在一些特定的区域协作平台，这是一些国家加强区域协作、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必然产物。“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实体性的国际组织，其运作机制与区域性国际组织存在根本上的差异，不可能干扰或破坏原有区域协作机制，挤压原有区域性国际组织的作用空间。相反，通过双多边对话方式，我国加强了与沿线国际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不仅推进了彼此的发展战略对接，也激发了区域性国际组织的活力。

正确认识“一带一路”需秉持正确义利观。要始终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反对“以利为先”的狭隘利益观。寻求义利协调是“一带一路”倡议实现共赢共享发展的重要价值导向，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片面强调“利己”或“利他”，都无助于“一带一路”实现更高水平的合作。要统筹好各参与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差异化利益之间的关系，弥合利益分歧、寻找利益交汇点，实现多方共赢。要针对不同国家的实际发展情况，在义利之间建立有机协调关系，最终实现各方共予共取、予取平衡的合作模式。鼓励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给予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必要的利益支持和发展扶持，解决其国内基本的民生问题，强化其自身造血功能。在推进过程中，应切实尊重各国自身意愿，不将经济问题政治化，不附加援助的政治条件，反对以政治手段解决债务问题；要遵循市场机制与商业规律，为各国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和选项，不干涉这些国家原有的对外合作关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学部工作局）